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

——以“学”为中心的考察*

易 凌 龚蛟腾 张晓芳

摘要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形成了以校讎、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等为核心的学术话语,在近代变革中出现了学科名称的简明表达、学科概念的准确阐释、学科术语的创新使用等转型趋势。其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呈现渐进特征,并趋向体系化发展,但最终陷入了支离窘境。当前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要吸取历史教训,夯实学科话语生成基础,巩固学科话语表达权力,推进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参考文献 88。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古代图书馆学 学术话语 话语体系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Science”

Yi Ling Gong Jiaoteng Zhang Xiaofang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as formed an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ollation, catalogue, edition, distinguishing false and compiling lost as the core. In the modern reform, there have been some transformation trends, such as the concise expression of discipline names, the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discipline concep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discipline term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showed gra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nded to develop systematically, but finally fell into a dilemma of separation.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draw historical lessons, consolidate the generation basis of discipline discourse and expression power of discipline discours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discourse system. 88 refs.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Discourse; Discourse System

中国古代形成了官府、私人、寺观、书院等四大类型的图书馆体系,同时也产生了作为治书之学的校讎学,“就其本质而言,我国古代的校讎学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学”^[1](16-17,75)]。傅荣贤与蒋永福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旗帜鲜明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理论、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总结”^[2](3)],或将其界定为“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实践方法及其思想观念的学问”^[3](48)]。古代图书馆学是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根基,在当前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

面向未来推进图书馆学的创新发展,也需要溯源历史巩固图书馆学的学理根基。话语研究的基本对象包括“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4],主要探讨话语对现实社会的建构、塑造与改变的作用与过程。就图书馆学而言,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是,德国图书馆学家 M. 施莱廷格于 1807 年使用“图书馆学”(德文 *Bibliothekswissenschaft*)这一术语标志着图书馆学的诞生。虽然这一观点存在一定争议,但可以反映出作为学术话语的表达方式——学科术语的使用对学术认知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因此,笔者试图通过考察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ATQ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学”为中心的学科名称术语,聚焦学术话语的核心表达方式,一方面溯回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另一方面透视其近代变革,以求揭示中国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古今之变。

本研究的基本前提有二:一是明确研究对象,即古代图书馆学的范围是什么。前期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之名,但是有图书馆学之实,包举校讎、目录、版本、辨伪、辑佚之学等的传统校讎学说就是古代图书馆学。二是确定转型时间,即古代图书馆学术话语古今之变的转折点是何时。综合李致忠^[5]、傅荣贤^{2}、蒋永福^{[3](48)}等的观点,我们将其确定为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一是古今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转型并不是一个骤变过程,而是以清末民初为主要转折时期而发生的渐变性转型。二是当时宏观的社会背景处于转型阶段,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竞合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出现剧烈变革。三是从中国图书馆学自身来看,一方面,作为“近代学术转型之际固守传统学术范式的代表人物”^[6]的叶德辉在1912年前后撰成《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藏书十约》等目录学、版本学专著,可视为古代图书馆学的尾声。另一方面,孙毓修在1909—1910年“爰仿密士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7]而成《图书馆》一书,可视为近代图书馆学的先声。

1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

1.1 渊源最久的“校讎之学”

校讎之事始于先秦,《国语》记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8]。校讎之名源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藏书始称“校讎”,又称“讎校”^[9]。刘向、刘歆《别录》《七略》蕴含的治书理论是古代图书馆学的萌芽,王子舟认为这是古代校讎学即治书之学的形成标志^[10]。南宋郑樵曾撰《通志·校讎略》,讨论求书、守书、分类、编目等治书方法,是“第一部全面阐释校讎学说的理论著作”^{[1](69)}。“校讎”与“学”的正式连接也始于南宋,戴栩《通赵寺簿启》中有“探子政校

讎之学”^[11],这是古代留存文献中较早称“校讎之学”者。一直到清代,章学诚称“校讎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12],肯定了向、歆父子开创传统校讎学说的功绩;并撰《校讎通义》,系统总结了分类、编目、校勘、典藏等的理论与方法,归纳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3](自序)}的传统校讎学说核心学理。此外,张金吾^[14]、丁申^{[15](213)}、朱一新^{[16](75-76)}在著述中也使用过“校讎之学”一词,并且朱一新关于校讎学学理还提出了与章氏相近的“商榷学术,洞澈源流”之说。由于“校讎”之义素来有广狭之分,广义包括一切治书事业,狭义则专指考订文字、厘定篇卷。后者一般专称“校勘”。南朝萧梁时期,沈约上书请求“校勘谱籍”^[17],始有“校勘”之名,其义实则与“校讎”混同。清代叶名澧《桥西杂记》称“校勘之学,宋儒所不废”^[18]。此后,张之洞^{[19](268)}、江藩^{[20](149)}、朱一新^{[16](94)}、叶德辉^{[21](40)}都使用过“校勘之学”一词。此外,清代段玉裁曾使用过“校定之学”^[22],其义与“校讎之学”“校勘之学”区别不大。以“校讎”为古代治书之学的总称,是渊源最久远、最正宗的,这也是仍称古代图书馆学为传统校讎学说的原因之一。

1.2 影响甚巨的“目录之学”

“目录”一词亦源自刘向、刘歆父子。《汉书》称其“爰著目录,略叙洪烈”^[23],此为目录之始。“目录”与“学”的连接始于北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中记载王钦臣曾被称赞有“目录之学”^[24]。清代章学诚^[12]、张金吾^[14]、宋翔凤^[25]、张之洞^{[19](120)}、江藩^{[20](147-149)}、朱一新^{[16](159)}、缪荃孙与叶德辉^{[21](40,413)}等都使用过“目录之学”这一术语。全祖望^[26]所称“书目之学”与丁申^{[15](210)}、叶德辉^[27]、叶启奎^{[21](352)}等所称“簿录之学”,都是“目录之学”的衍生词,未脱离“目”与“录”。另外,作为概称九流、《七略》的“流略之学”,也是“目录之学”的近义词。在南朝齐、梁间处士阮孝绪的《七录·序》中,阮氏自称“少爱坟籍,长而弗倦”,但“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奥秘”^[28]。北宋宋庠称赞其友人孙氏“贯流略之

学”^[29],这是关于“流略之学”的最早记载。其后清代叶昌炽自称“喜为流略之学”^[30],并撰有《藏书纪事诗》一书。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不使用“之”作为连接助词的术语“目录学”。耿文光《苏溪渔隐读书谱》称“目录学者,学读书也”,是已知关于“目录学”一词的最早记载^{[31](340)}。作为治书之学的统称,“目录之学”术语的使用频率不在“校讎之学”之下,这主要是由于清代学者的鼓吹,其中王鸣盛堪称最有力者。王氏在《十七史商榷》中极力强调,“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又称“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32]。王氏之说不仅被清代学者奉为圭臬,至今仍有学者称赞其观点。此外,也有两“学”合称者,如朱一新所言“目录校讎之学”、叶启崑^{[21](352)}所言“目录版本之学”等。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不同学者即使使用同一术语,其内涵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应根据实际语境具体判断。

1.3 纷繁别出的版本诸“学”

版本、辨伪、辑佚之学等都是传统校讎学说的重要分支。版本又称板本,源自雕版印刷,其名始于宋代。《宋史》关于“版(板)本”有多处记载,如《真宗本纪》中“高琼求板本经史”,《赵安仁传》中“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儒林传》中“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等等^[33]。叶梦得《石林燕语》中也有“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34]等语。这说明“版(板)本”在宋代已经成为专有名词,不过版本称“学”则较晚,清末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与《书林余话》中明确使用了“版(板)本之学”^{[21](40,399)}术语。“辨伪”与“辨伪之学”的出现比较早。《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吴筠所撰《明真辨伪论》^[35],元代僧人祥迈撰有《元至元辨伪录》^[36],宋代刘敞《上仁宗论龙昌期学术乖僻》中有“奔走于辨伪之学,沉没于非圣人之论”^[37],这些其实是从宗教或政治的“卫道”角度而提出的“辨伪”,与传统校讎学说语境中的文献辨伪存在区别。如明代宋濂《诸子辩》、胡应麟《四部正讹》等虽未称“辨伪”,但却是事实上的文

献辨伪研究。清代唐焕《尚书辨伪》^[38]与崔述《古文尚书辨伪》^[39]是较早以“辨伪”为书名的辨伪学专著。“辑佚”实践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宋代已有系统的辑佚之事^[40]。清代孙星衍《章宗源传》中的“辑录”“辑书”^[41],章学诚《校讎通义》中的“采辑补缀”^{[13](34)},都是“辑佚”的同义词。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称章宗源“好辑佚书”^[42],正式使用了“辑佚”术语。皮锡瑞《经学历史》以“辑佚书”为“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之一,称“至国朝而此学极盛”^[43],实现了“辑佚”与“学”的初步连接。此外,戴震称余萧客师从惠栋学得“稽古之学”^[44],张金吾自称其“纂集经说,采辑金文”为“汇萃之学”^[14],都是“辑佚之学”的形象化表述而非专指。

2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变革

由校讎、目录、版本、辨伪、辑佚诸学共同构成的古代图书馆学,其理论脉络连贯、条理明晰,不过也存在学术话语含混不明、彼此孤立等问题。一方面,古代学者重用而轻义,并没有阐明校讎学、目录学等术语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缺乏宏观的学科体系意识,校讎、目录等研究领域未能聚集到统一的话语体系之中。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科学思潮与研究范式强势登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在中、西、古、今彼此交锋的学术竞争格局中积极吸收西方科学范式的长处,从学科名称的表达、学科概念的阐释、学科术语的使用等方面推进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变革。

2.1 学科名称的简明表达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近代变革的首要表现是话语表述趋于科学化。近代时期的“科学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化”,具体到语言文字方面就是白话化、简明化。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简明表达最直接的表现是传统术语普遍使用的“之”字被取消。作为连接助词的“之”其实并无实义,但由于长期的文言习惯以及对于音韵节律的追求,“校讎之学”“目录之学”等是古代术语概

念使用的主流形式。仅清代耿文光在《苏溪渔隐读书谱》中使用了“目录学”，且其后又使用了“目录之学”^{[31](340,345)}。随着西方科学话语的强势输入，以文言为表现形式的传统学术话语趋于式微，简洁直白的白话文逐渐居于学术话语表达的中心地位。作为清末民初“浅近文言”倡导者^[45]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乾嘉朴学时使用了“目录学”“校勘学”^{[46](47)}术语。另外，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详细探讨了古代“辨伪学”^[47]的发展历程。孙德谦《刘向校讎学纂微》虽以文言写成，但使用“校讎学”^[48]总括刘氏的治书成就，而非传统的“校讎之学”。1933年，钱子泉在《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发表论文《版本学》^[49]，也没有使用“之”字。至于“辑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仍用“辑佚之学”^{[46](75)}，1933年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则正式使用了“辑佚学”术语^[50]。直接以“××学”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总名，简洁明了，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由于话语转变的渐进性，不少学者在具体表述中仍旧使用“××之学”。学科名称的白话表达是古典文言形式的学术话语向现代白话形式的科学话语转型的直接表现，也是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近代变革的第一步。

2.2 学科概念的准确阐释

传统学术时代虽然形成了各门学术研究领域，但是学者们多秉持朴素的实用主义治学精神，注重学术之用，而轻忽学术之义。纵使章学诚撰《校讎通义》，也并未直接阐释“校讎之学”的内涵，只是说“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3](自序)}。近代时期，随着科学思潮的日益发展，传统校讎学说研究者们逐渐吸纳科学范式，尝试明确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涵，准确阐释学科概念的意义。胡朴安等著《校讎学》，认为校讎学就是“治书之学”，并区分了包括“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的“广义”校讎学，以及“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的“狭义”校勘学^[51]。姚名达明确指出了目录学的

研究对象是“篇目和叙录”^{[52](9-10)}，一方面重新组织章学诚的文言原话，一方面以简洁白话详细阐释了目录学的学科定义。蒋镜寰在《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发表《板本学答问》一文，开篇即申明“板本学为研究书籍之版刻年代、印刷情形及编纂、校讎等事之专门学问”^[53]，给版(板)本学下了一个具体的定义。至于辨伪与辑佚，近代学者虽称之为“学”，但实际上更重视其实践工作而轻视其理论阐发，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辨伪书”的种类、动机、方法及对清儒“辑佚书”成绩的总结^[54]，已经是比较有理论高度的了，亦未曾直接阐释辨伪学、辑佚学的具体内涵。准确阐释学科概念的背后是传统学术范式向近现代科学范式的转型，是以会通为旨趣的传统学术追求向以专精为导向的现代科学精神的转型，同时准确阐释学科概念也是建设科学化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2.3 学科术语的创新使用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变革不仅表现为表述方式、内涵阐释的完善，也体现在术语、概念的创新使用上。以杜定友《校讎新义》为例，其使用了“图书之学”“书籍之学”“类例之学”等多种新术语^[55,56]。姚名达借用西方学界的 Literature History、Bibliography 与 Catalogue，分别指代“书史学”“书志学”与“书目学”^{[52](30)}，将其视为“目录学”的基础知识。其中“书志学”术语的使用深受日本影响。1932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就介绍了日本学者橘井清二郎的《西洋书志学要略》^[57]，1933年李尚友译介了日本学者小见山寿海的《书志学》，认为书志学略同于“中国过去所谓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知识”^[58]。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传统校讎学说就是古代图书馆学，但是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出现更多是受西式图书馆学的影响，包括“图书馆学”^[59]之名，也是由欧美—日本—中国为途径翻译而成的汉语名词。刘国钧认为“板本学”“校勘学”“目录学”作为“研究图书之一般的内容”^[60]，是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

程伯群将“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总结为“书志目录学”^[61],视为中国古代生成的与西方“图书馆学”对标的学问。在刘、程的推动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初步实现了与近现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对接。

3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发展审视

3.1 话语转变呈现渐进特征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近代转型的首要特征是渐进性,表现为一种缓慢的、温和的甚至于存在反复的转变。首先,在近代时期汉语体系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变革中,传统校雠学说的古典文言式学术话语受到强烈冲击,“之乎者也”这些“助得甚事”^[62]的虚词在学术论著中渐渐消退,然而古典文言式话语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无论是坚守旧学范式的孙德谦、刘咸炘,还是兼通中西的杜定友、姚名达,虽然都很明确地使用了“校雠学”“目录学”术语,但“校雠之学”“目录之学”仍时常出现在其论著的具体表述中。其次,关于学科概念的内涵以及以何者为学科统称,不同学者之间歧见纷然,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姚名达主张“校雠之义即为整理”,“校雠整理之学”就是“目录学”^[63]。程千帆指出“名义纷如,当加厘正,则校雠二字,沿用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64],从历史沿袭角度明确“校雠”为学科统称。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旨在纂述广义的校雠学之大要,但为使读者易于明了所涉的范围计,故并举‘校雠’‘目录’二者以名之”^[65],综合二者作为学科总名。再者,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并非简单地由“校雠”转向“图书馆”。如前所述,刘国钧认为校雠学等是图书馆学的分支学科,程伯群将其视为与西式图书馆学对等的学问。1947年徐家麟指出“虽说双方的工作范畴有差异,不容混而为一,但能互相通假的地方,究竟是不算太少的。可是直到现在,我国目录学界与图书馆学界,还各守疆界,彼此歧视,甚至互相轻视”^[66]。可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近现代图书馆学虽然一脉相承,但其学术话语近代转型

的脉络实则错综复杂,并非简单地由近代话语取代古代话语而已。

3.2 话语发展趋向体系建设

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像近代西方分科性的‘专门之学’”^[67],而是秉持“会通之义”^[68]来开展学术研究。这一方面促成了以文献为中心的传统校雠学说的形成,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脉络连贯、条理清晰的古代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近代时期,图书馆学学者们试图推进学科话语的体系化建设。首先,在术语体系的系统整理方面,首推卢震京《图书学大辞典》的编纂。其涵盖“图书学原理,图书馆方法,图书馆行政,图书馆史,著名图书馆之机关或团体,以及与图书有关之各项学术,如:校雠学,书史学,版本学,目录学,读书法,书业学,印刷,装订等要项”^[69],将西式图书馆学与传统校雠学说都归并于“图书学”话语之下。其次,术语建设是图书馆学界的重点关注领域。1923年查修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上提出了“图书馆事业办法及应用名辞等等应有规定之标准案”^[70],1929年李继先、金敏甫、李小缘、万国鼎等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共同提交了“订定中国图书馆学术语案”^[71],倡导、推进学科术语体系的建设发展。再者,基于学科术语内涵的科学阐释,传统校雠学说理论体系也逐渐系统化。范希曾^[72]、胡朴安^[51]、张舜徽^{[73](7-8)}等认为是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共同组成了“校雠学”理论体系。傅振伦^[74]以“求书,治书,藏书”为校雠学的主体,熔中西图书馆学理论于一炉。程千帆^[64]在“版本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后,补充“藏弃之学”,共同作为传统校雠学说的分支学科。黎锦熙^[75]尝试以“校雠之学”为基础构建“新目录学”,推动传统校雠学说的创新发展。不过,近代学者虽然极力推进古代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建设,但到最终实现体系化建设还存在距离。

3.3 话语转型陷入支离窘境

转型意味着突破,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近代科学思潮大兴的时势背景下,在众多学人

持之以恒的探究钻研中,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自然不至于失败,但确实也陷入了支离的窘境。范希曾有言:“然全材今昔所难,世或得一察以自好。于是校讎之学,散而为校勘之学、版本之学、目录流略之学,而皆得以冒校讎之名,要之皆非其全。”^[72]胡朴安等则更明确地指出传统校讎学说中各分支学科的分散,“虽有往而不返之虞,然亦事势所然。且分之愈细,则治之愈密,将俟大有力者总其成也”^[51],期待有“全材”或“大有力者”能够总结传统校讎学说理论体系,提升学科理论高度。其后程千帆虽有意撰《校讎广义》,且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76],但终究未能在近代这一时限中完成。张舜徽《广校讎略》于1945年问世,但“仅刷印五百部,故流布甚稀”^{[73](4)},而且体例稍显零落,实际上亦未能达到“总其成”的效果。至于姚名达重新阐释“校讎”为“整理”之义,试图以“目录学”包举“校讎目录之学”^[63],但只得“目录之学”一偏,说不上“总其成”。正如前期研究所揭示的,传统校讎学说的近代分化与转型表现为“目录学敛缩而偏安一隅”“图书馆学日渐承其主体”“文献类学科群各取所需”^[77]。古代学术话语被图书馆学、校讎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割裂,处于离散游移状态。而且要注意的是,古代广义的“校讎学”与当前所言“古代图书馆学”之间,是“关联最紧密但不完全重合”^{[3](46)}的关系。故而我们使用“传统校讎学说”这一概念折中地指代古代图书馆学,以总括治书诸学而避免其话语支离分化的问题,力图实现梁启超倡导的“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目标。

4 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转型启示

4.1 夯实学科话语生成基础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其对应的事业实践与理论研究是话语生成的基础。只有夯实基础,才能保障学科话语的持续生长与创新发展。在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过程中,从学科名称来看,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学科话语核心由

“校讎”转向“目录”再转向“图书馆”的过程。若以今律古,可以将其视为古代图书馆学的近现代科学化转型。然而若从传统校讎学说本身来看,这也是“校讎之学”逐渐丧失话语核心地位、甚至逸出学科话语体系的过程。虽然刘向“校讎”的本义是对文献中文字、篇卷的订正,但无论是郑樵的《通志·校讎略》,还是章学诚的《校讎通义》,都是以“校讎”作为治书之事与治书之学的总名。从流程来说,“目录”只是“校讎”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整个治书过程。但随着古代各种官私目录著作的问世与传播,“目录之学”跃居“校讎之学”之上,逐渐有独立成学之势。及至近代,汇集文献而且公开共享的图书馆事业兴盛发达,图书馆目录逐渐取代了传统目录的地位,目录学因而也成为近现代图书馆学的分支庸庸。这提醒我们,对于当前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而言,尤其是在建设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方面,必须警惕由国外iSchools院校主导的“去图书馆化”倾向。随着院校名称、学位教育、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的“去图书馆化”^[78],若图书馆学的学科建制不再以“图书馆”为基础,或不再以“图书馆”为名,那么图书馆学何以名为“图书馆学”?当前,图书馆事业实践正不断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亦持续创新,但若不能有机结合实践与理论并转化为文本表达与话语输出的基础,那么学科基础与学科话语之间必将出现愈来愈大且难以弥缝的鸿沟。唯有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此夯实图书馆学的学科根基,才能有效保障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

4.2 巩固学科话语表达权力

学科话语表达权力是指学科自由地对社会事实进行理论阐释并输出理论成果的权力,即学科的话语影响力,体现为学科理论被认可或接受的程度。从古今对比来看,古代传统校讎学说的影响力其实要高于近代。古代从事传统校讎学说理论研究并掌握其话语权力的学者一般是当时社会最顶尖的精英,譬如刘向官封光禄大夫,荀勖、王俭、魏徵、程俱等都是当时的秘书监(省)长官,郑樵被封为右迪功郎,章学诚也曾任国子监典籍,纵

使阮孝绪是一介处士,却也是名列正史的人物。这些学者不仅是校雠学家,同时大多也是经学家、史学家,不仅享有学术声望,而且具备政治地位。但这也给传统校雠学说带来了学术话语被经学、史学所掩盖的问题。史学家金毓黻曾指出,“校雠之学,为史学之支裔”^[79],将其视为史学的附庸。传统校雠学说在与西式图书馆学彼此竞合而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不复昔日鼎盛,但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成为图书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拥有了完善的学术建制。从学人角度来说,如杜定友、王重民、顾廷龙等前辈大家,不仅身兼图书馆学理论家与图书馆事业家,同时也是校雠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从学科教育来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等通过开设“目录学”“书史学”“古书校读法”“版本学”等课程^[80],将古代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纳入近现代高等教育之中。从学术成果来说,根据范凡的统计,民国“文献目录学”著作数量在整个图书馆学著作分类排序中居第4位^[81]。当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当建立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总基础之上,要在专业教育、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学科交流、社会服务的齐头并进中提升话语影响力。

4.3 推进学科话语体系建设

无论是夯实话语生成基础,还是巩固话语表达权力,最终目的都是要推进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从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近代转型中,可以归纳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三条重要原则。首先,只有加强历史传承与未来创新的协同,才能厚植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根基,保障其行稳致远。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必须对中西图书馆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82]。只有在古代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才能彰显中国学术的历史底蕴。其次,只有推进本土化与世界化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图书馆学话语创新与话语传播。近代所确立的西方科学范式直至今日仍

有着巨大影响力,古代中国所形成的传统学术范式确实难以与之抗衡。但是西方科学范式并不是万能而完美的,中国传统学术亦非一无所长,只有两相结合才能有效推动传统校雠学说向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应当将西方目录学“注重事实,旨在解决是与非”与中国目录学“注重价值观念和道德,旨在回应应该或不应该”^[83]的学术旨趣加以调和,取长补短。再者,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为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古代图书馆学存在重道轻器的积弊,而近代图书馆学“馆内之学”的机构范式同样也束缚了学科发展。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一方面要继承并弘扬“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84],在传统校雠学说的“超越旨趣”^[85]基础上提升理论阐释水平;另一方面要关注图书馆事业现实问题,面向实际的社会需求加强学科建设。

5 结语

正如彭斐章所言:“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历史连续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历史是不容割断的,没有过去,就没有今天,更没有未来。不懂得过去,就无法了解当前,也就不可能预测未来。”^[86]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的创新发展,必然要以古代、近代、现代图书馆学积累的理论成就为基础,在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背景中继续前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作为中国原生、独创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为世界图书馆学学术殿堂的丰富构筑了独特基石。在近代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中西学术竞合中虽然未能占据优势地位,往昔辉煌的学术地位不再,但其“治书治学”的学术核心、“释道明道”的价值取向、“教化育人”的社会功用奠定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根基^[87]。当然,也必须正视古代图书馆学学术话语的笼统模糊、理论内涵的缠杂不清、理论旨趣的重道轻器等积弊,并从中总结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所谓“创

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88],在古代图书馆学开创的基石之上,今人必将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图书馆学话语体系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添砖加瓦,为世界图书馆学的繁荣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 1 龚蛟腾. 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校雠学说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 2 傅荣贤.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 3 蒋永福.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4 高玉. 论“话语”及其“话语研究”的学术范式意义[J]. 学海, 2006(4): 104-112.
- 5 李致忠. 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代自序)[M]//三目类序释评.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 6 张晶萍. 叶德辉的思想与学术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08: 174.
- 7 孙毓修.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1: 图书馆[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4.
- 8 左丘明. 国语[M]. 韦昭,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43.
- 9 刘向. 七略别录[G]//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6.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157-163.
- 10 王子舟. 图书馆学是什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55.
- 11 戴栩. 通赵寺簿启[G]//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308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85-186.
- 12 章学诚. 论校雠(十则)[G]//张舜徽. 文献学论著辑要.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86-288.
- 13 章学诚. 校雠通义通解[M]. 王重民, 通解. 傅杰, 导读. 田映溪, 补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14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G]//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4-55.
- 15 丁申. 武林藏书录[M]. 陈晓兰, 点校//胡应麟. 经籍会通: 外四种(第2版).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8.
- 16 朱一新. 无邪堂答问[M]. 吕鸿儒, 张长法,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7 沈约. 沈约集校笺[M]. 陈庆元, 校笺.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5: 96.
- 18 叶名澧. 桥西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49.
- 19 张之洞. 书目答问补订[M]. 范希曾, 补. 徐扬杰, 订.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 20 江藩. 经解入门[M]. 北平: 文化学社, 1932.
- 21 叶德辉. 书林清话: 外二种[M]. 漆永祥, 点校.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 22 段玉裁. 论校书(五则)[G]//张舜徽. 文献学论著辑要. 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89-290.
- 23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076.
- 24 苏象先. 丞相魏公谭训: 卷4[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
- 25 瞿镛.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序.
- 26 全祖望.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 朱铸禹, 汇校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611.
- 27 叶德辉. 校刻百川书志序[M]//高濂, 周弘祖. 百川书志 古今书刻.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4-5.
- 28 任莉莉. 七录辑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2.
- 29 宋庠. 元宪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369.
- 30 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M]. 王锴, 伏亚鹏, 点校.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自序.
- 31 耿文光. 苏溪渔隐读书谱[G]//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171册.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32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黄曙辉, 点校.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 45.
- 33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8, 9656, 12822.
- 34 叶梦得. 石林燕语[M]. 宇文绍奕, 考异. 侯忠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16.
- 35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520.
- 36 释祥迈. 元至元辨伪录[M/OL]. [2021-08-01].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Detail?searchType=all&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d=ZHCH1064.
- 37 刘敞. 公是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389.
- 38 姚鼐. 尚书辨伪序[M]//姚鼐. 惜抱轩全集. 上海: 世界书局, 1936: 193.
- 39 崔述. 古文尚书辨伪[M]//崔述. 崔东壁先生遗书十九种: 下. 那珂通世, 校点.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221-296.
- 40 杜泽逊.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78.
- 41 孙星衍. 五松园文稿[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1.
- 42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 下[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494.
- 43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周予同, 注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30.
- 44 戴震. 古经解诂沉序[M]//戴震. 戴震文集. 赵玉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45-146.
- 45 邓伟. 分裂与建构: 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1.
- 46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朱维铮, 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47 梁启超. 国学要籍研读法四种[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 20.
- 48 孙德谦. 刘向校讎学纂微[G]//杨家骆. 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稿: 经籍典. 台北: 鼎文书局, 1977: 23.
- 49 钱子泉. 版本学[J]. 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3(3): 21-22.
- 50 谭正璧. 国学概论讲话[M]. 上海: 光明书局, 1933: 33.
- 51 胡朴安, 胡道静. 校讎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1-2.
- 52 姚名达. 目录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53 蒋镜寰. 版本学问答[J].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 1936: 1-24.
- 54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武汉: 崇文书局, 2015: 214-231.
- 55 杜定友. 校讎新义: 上册[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3: 自叙, 4, 12, 32.
- 56 杜定友. 校讎新义: 下册[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3: 1-2, 9, 16, 24-25.
- 57 佚名. 西洋书志学要略[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2(6): 41.
- 58 小见山寿海. 书志学[J]. 李尚友, 译. 图书馆学季刊, 1934(3): 357-410.
- 59 平保兴. 关于三个图书馆学术史问题的商榷[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3(6): 109-111, 96.
- 60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 12-13.
- 61 程伯群. 比较图书馆学[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5: 自序.
- 62 文莹. 湘山野录续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5.
- 63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8-9.
- 64 程会昌. 校讎广义叙目[J]. 斯文, 1941(20): 4-8.
- 65 蒋伯潜. 校讎目录学纂要[M]. 南京: 正中书局, 1946: 4.
- 66 钱亚新. 郑樵校讎略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徐序.
- 67 左玉河.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98.
- 68 郑樵. 通志二十略[M]. 王叔民, 点校. 北京:

- 中华书局,1995:通志总序.
- 69 卢震京. 图书学大辞典[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编辑大意.
- 70 第三十图书馆教育组[J]. 新教育,1923(2/3):295-317.
- 71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R]. 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156-158.
- 72 范希曾. 校雠学杂述(一)[J]. 史学杂志,1929(1):1-3.
- 73 张舜徽. 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74 傅振伦. 校雠新论[J]. 图书馆学季刊,1931(2):163-177.
- 75 黎锦熙. 新目录学论丛[M]. 长沙:湖南大学,1948:1-3.
- 76 程千帆,徐有富. 校雠广义:版本编(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20:校雠广义叙录.
- 77 刘春云,龚蛟腾. 从图书馆学视角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110-115.
- 78 司莉,郭财强. 再探国外 iSchools 院校的“去图书馆化”倾向[J]. 图书与情报,2019(5):65-71.
- 79 金毓黻. 中国史学史[M].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252.
- 80 任家乐.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156-157,159-161,167-169,173-176,178-182.
- 81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45.
- 82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15.
- 83 傅荣贤. 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332.
- 84 李明杰.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从文献学路径获得的认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1):27-34.
- 85 傅荣贤. 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进路[J]. 图书馆,2010(3):35-38.
- 86 彭斐章. 文华回眸[M]//肖希明. 图书馆学研究进展.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14.
- 87 龚蛟腾,朱潇娜. 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理的嬗变与开新[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114-121.
- 88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99.
- (易凌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图书馆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龚蛟腾 教授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晓芳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收稿日期:2021-12-08